

“一带一路”毕竟不是中国自己就可以解决的事,而当前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公关和推介,这已经成为推进这一战略最大的外部障碍之一。

# 中国“一带一路”落实亟须细节

曹辛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在中国举国进入“一带一路”时代后,这一战略的落实情况如何?毛泽东曾说过:“(对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以欧洲和印度为例,欧洲是“一带一路”北线极其重要的地区和目的地,印度则是南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重要目的地。然而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却是:目前在欧盟国家内部,对中国这一战略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但私下在相当程度上持保留、乃至怀疑的态度;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印度,则另有一番盘算。

“一带一路”进入举国推进阶段后,细节落实就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在当前,以下几个问题比较突出,必须予以解决。

## 缺乏有效的国际公关和推介

“一带一路”毕竟不是中国自己就可以解决的事,而当前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公关和推介,这已经成为推进这一战略最大的外部障碍之一。我们从外方对“一带一路”的评论中,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

一位欧陆大国官员告诉笔者:“‘一带一路’?还不如叫‘丝绸之路’更清晰,我们欧洲人都知道。”该国官员还向笔者表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到底是什么?是政治考虑更多?还是经济考虑更多?”其疑虑和观望的态度溢于言表,而且显然已经有了初步结论。

而另一个欧陆大国、同时也是经济强国的官员则明确表示:“你们中国在自己的周边搞‘一带一路’,例如在中亚,我们不持异议,但搞到欧洲,我们不赞成、有保留。”欧洲一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则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解释,他告诉笔者: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总量,而欧洲都是小国,欧洲自然会有人认为这一战略是“明显借经济实力扩大经济乃至政治势力范围”了。而且客观来说,“欧洲自己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也有一个要东扩、要遏制俄罗斯的问题,而你们‘一带一路’的西进路线在越过中亚后,也会进入我们当前正想东扩的欧洲部分,例如那些欧洲前苏联集团国家……”

近来上述状况有所变化,一些国家在公开场合开始表示要和中国合作,但在欧洲大国里,保留和怀疑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

而印度的官员则表示:“势力均衡”是印度外交最重要的核心,因此印度不可能只把招商引资、解决印度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的宝都押在中国一家身上,而要“均衡”。上述反映除了利益冲突的客观原因外,也确有对外关系不和解、前景不明朗的问题。

从当前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看,负责与国际社会保持日常密切联系的职能部门,无论是外交部还是中联部,都不是经济部门,处于有渠道但不了解情况的状况,这势必影响其推广“一带一路”的效果;而发改委和商务部是经济职能部门,但在同国际社会的联络方面相比外事部门,无论是渠道还是权威性都不够。

还有一个大的根本背景是:国际宣讲的薄弱和缺乏说服力,一直是近年来中国的软肋。

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公关和说服机会的。例如上述欧陆经济强国的官员在被笔者问及:“(中国)扩展到欧洲你们不同意)如果以双方合作合资形式在欧洲推进‘一



带一路’战略,双方共同牟利,你们能否接受?”时,对方官员当即表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同时,印度官员在声称“印度可能是‘一带一路’唯一的麻烦”的同时,也向笔者透露:根据他们的调查,在电力(特别是火力电站)、公路和铁路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同其他外国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比,“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完全不用担心在公开投标中出局。”这显然是一种暗示。

而从目前已经公布“一带一路”战略落实的情况来看,很难看到公关和说服的痕迹。

## 国别调研不够扎实

当前的另一个问题是,“该国官员还向笔者表示:‘一带一路’的国别调研不够扎实、深入,而这是确保对当地投资环境有准确判断、从而将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的前提。

可当前我们看到的却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呈现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一窝蜂地纷纷开始研究“一带一路”的倾向。仅从中联部可以在短时间内在全国成立多达59家的“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就可以看出这个现象。但扎实的国别研究成果则很难看到。

关于因缺乏扎实、深入的国别调研导致中国海外投资越来越呈现高风险的案例,近年来不断涌现。在东南亚的泰国、缅甸,在拉美有的国家,中国的大型投资项目不断搁浅,其中多为项目所在国当地政府更迭或外部力量介入引起,造成国有财富的巨大损失。中国政府领导人也曾出面协调,但收效不大。

而在近日,浙江宁波又召开了“首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但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在去年9月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论坛”上,与会的中东欧国家外交官和学者在会上透露出来的信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此次会上,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玛丽娅·阿达妮娅介绍说: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中东欧重新发掘新的发展动力,以改善这一状况。匈牙利驻华大使更是把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说:16个中东欧国家有11个是欧盟成员,6个正处于不同的申请阶段中。更重要的是,16国都十分重视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并把它视为“未来的保障”。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深化和扩大化的前提是:“我们要把这项合作视作中国——欧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而欧盟的态度倒是十分明确:就在去年底李克强总理前往贝尔格莱德出席第三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时,德国驻华使馆给笔者发来邮件说:“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和商业行为必须符合欧盟的法律;项目投资必须要履行公开的竞标程序;欧盟对外部门必须全程参与相关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盟3月已经启

动了315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也要以扩大投资来刺激欧盟经济。这和中国“一带一路”有交集吗?还是冲突?

捷克学者福斯特在会上指出:目前16个中东欧国家只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兰和匈牙利和中国交往频繁,其他国家和中国尚需“增加了解和互信”。

实际上,对当前部分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因欧盟不能给这些国家经济好处而倾向于俄罗斯、中国的“向东方”的态势,欧盟大国对此也有反弹。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如此,调研的扎实和深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安全。例如,当前南海危机对中国落实“海上丝绸之路”的风险有多大?哪些东南亚国家会受其影响?这些都直接关乎“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功落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此次会见昂山素季的启示:在那些政局不稳、或者存在潜在内外政治风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奉行与所在地朝、野同时接触、发展关系的方针,至少不能只顾当前,不理在野的,起码不要得罪在野的,这样才能确保投资不打水漂。

既要“一带一路”,“不干涉内政”原则就要与时俱进。

而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据业内人士说:有的国企只顾投资,明知有风险也要上项目。《上海证券报》6月16日报道还说:境外国有资本已超过12万亿,国企管理层腐败导致巨额损失。这是否就是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说的“利益集团影响中国外交”呢?

## 国内已出现“同质化竞争”

今年4月,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表示:“一带一路”不存在哪个省缺席的问题。

虽然号召举国参与,但各地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色,找准自己的定位,有针对性地参与,这才是成功的关键。而现实情况是,相关省份间已经出现同质化竞争。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西部的陕、甘、宁以及新疆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已经出现“战略定位相似、同质化竞争”问题。

西安市社科院某研究人员向新华社记者介绍:“‘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自我定位有重复之处,仅经济带的起点就有重庆、陕西、河南等多个省市争抢。”

而甘肃农业大学一位教授则告诉新华社记者:“在资源禀赋相似、市场发育程度相似、缺乏对中亚以及周边政治环境与市场实际研究的条件下,沿线省市选择了近乎雷同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这位教授说:“我们面对同一个境外市场,产业布局重叠的话,可能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他介绍说,西部几个重要城市仍有要政策、要项目的传统思维,在重点任务上,都提出建设能源中心和金融中心,并将落

措施集中为设立自贸区、保税区、论坛永久会址等。

另一位研究人士向新华社介绍说:沿线省区部分项目的同质化竞争已造成资源浪费。丝路沿线现有渝新欧、郑新欧等8条国际货运班列同线竞争,近期安徽也加入竞争,“但班列普遍存在问题,如出境时满载,但返回时严重缺乏货源,有些班列互挖货源端脚、恶性竞争;有些要政府出价补贴才能维持发展。”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论坛、会议满天飞。

根据新华社的调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后,陕甘宁及新疆等竞相召开与建设主题相关的论坛和会议,纷纷邀请丝路沿线国家当地政商界参会参团。陕西、新疆和甘肃都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举办丝绸之路博览会的建议,陕西2013年还提前举办了冠名丝绸之路的国际博览会。

甘肃省贸促会副会长吴霞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易给中亚国家造成不良感觉,认为国内之间竞争混乱无序,影响国家形象。”宁夏某政府官员对此表示,新疆、甘肃、宁夏已先后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论坛、亚欧博览会、中国—中亚合作对话等专题论坛,但论坛“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复,影响力和实际效果不显著”。他说:“目前,在以经济带建设为主题的由政府主导的博览会或论坛上,我国在中亚、中东等地区的签约项目能实实在在地在落地寥寥无几。”

西部地区的上述现象,东部沿海地区也有。这些现象和模式我们是如此地熟悉,而且已成为一种顽疾和无奈。然而这个问题不解决,落实“一带一路”就会麻烦不断。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扎扎实实地协调才是。

## 产业和项目对接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实际上,落实“一带一路”最根本的问题是:实现中外产业和项目的对接,并要为此种对接建立一种不仅针对国企,同时也针对民企的有效平台和机制。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将将是空谈。

这种平台和机制必须围绕下列工作核心进行:切实弄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重点城市希望引资发展的产业、经济领域和项目;希望引入的投资额及投资环境和前景等信息,并以合适方式向国内的企业和部门发布。同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重要城市提供有意愿向外发展的各类中资企业的对外投资意向和相关信息,包括行业、项目和投资额等。在此基础上,促进和帮助中外商业交易。

特别要通过扎实的国别调研,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投资环境等情况,供中方投资者参考,确保中方投资这样的。

然而这样的机制和平台,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宁波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投资博览会”方向正确,但在中国和欧盟达成有效协调之前,中东欧地区无疑是一块投资环境糟糕的地方。

而且,我们目前看到国内一窝蜂出现的“一带一路”智库和专家们的研究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现象:谈整体战略者多,谈具体战术者少;谈宏观者多,谈微观者少;谈全局者多,谈局部者少;赞美者多而谈不足并给出完善建议者少。这样的智库和专家,是没有意义、不能信任的。

举国体制,必须和扎扎实实的细节结合起来,则必能事半功倍;否则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后患极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一带一路”刚进入落实阶段不久,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 如何用模型分析中国经济?

邹至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宏观经济模型是用一系列的数学方程来代表一个宏观经济的运作。计量经济学家用统计数据来估计模型的参数。模型有两个用途。一是分析和了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二是用来作预测。我们可以假定不同政策变量的变量,例如政府支出或货币供应的变量,再用一个模型来作预测,便可以衡量不同政策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此来决定采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介绍两个简单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给读者参考。

第一个模型是利用中国从1952年至1983年的第一个数据,来估计中国的一个是解释总消费。另一个是解释总消费或总投资。消费和投资是国内总生产GDP的两部分。第三部分是不用模型解释的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

解释总消费的方程有两个变数,一是GDP,二是去年的总消费。要解释投资,我们先考虑资本的决定。因为投资是资本数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与总生产GDP成正比。投资便是由GDP的增加来决定。

读者或会问上述的模型是根据西方的经济理论建立的,可能不会适用于中国的经济。我的回答是:第一,中国居民的总消费行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居民的行为是一样的。当时中国消费给必需品,控制了粮食与棉布等的消费量。但是当居民不能多购买必需品时他们会用收入购买别的消费品。总消费与总收入的关系和用收入购买的是一样的。关于总投资,我们假定它是总资本的增加和假定资本是与GDP成正比。这种经济变量的关系,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也是适用的。

这个模型是在我在1980年代初期研究的结果。1985年我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期刊出版。近年来我再用直到2006年和2009年新的数据,把这个模型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的《Economic Letters》经济学期刊出版。介绍研究的主要结果,即模型从1978年后不变,这证明适当的经济模型是跨时代的。

第二个模型是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建立。模型增加了两个政策变数,即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分别代表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的是研究这两个变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模型共有5个联立方程来决定5个经济变数:GDP、总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我们要研究各变数的互相关系。一般来说,讨论经济变数的互相关系是一个经济学基本的方法。例如一个消费品的生产量(假定等于消费量)和它的价格是互影响的。根据需求函数的理论,当价格增加,消费量会减小。根据供给函数的理论,当价格增加,供应量会增加。同样的,在第二个模型,GDP、总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是有互相关系。在下面我要讨论这五个变数的互相关系,涉及内容是属于专业性的。

第一方程定义总消费,与第一模型的相同。第二方程解释总消费,是根据第一模型的理论,再添上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可能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的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总消费可能有正面的影响。第三方解释总投资,是根据第一模型的理论,再加上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可能对投资的影响。研究的结果发现货币供应对投资有正面的影响。因此政府支出可以用来增加总投资。第四方程解释政府支出。研究的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单是由政府决定的,不受其他四个变数的影响。但是它可能影响总消费。因此政府支出可以用来增加总消费。第五方程解释货币供应。发现GDP对货币供应有正面的影响。这便是说,当收入增加时,人们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应与消费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当居民增加消费时会把他们的货币用了。

建立了第二个模型以后,我们能够多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运作。还可以用模型来作预测。既能作预测,我们便可假定采用某种经济政策,再用模型来预测政策的效果。这样便可以用经济模型来衡量政策的好坏。

## 热视角

## 美国GDP数据助美元小幅反弹

在6月24日美国公布第一季度增长率的最终读数之后,美元出现了小幅反弹。6月24日的增长数据证实,美国经济的收缩程度不如一开始猜测的那么严重。

在关注着希腊违约以及该国可能退出欧元区这一日益加大的威胁的话题时,投资者的心思重新回到了他们最喜欢的话题——美联储(Fed)可能启动金融危机以来第一轮加息周期。

修订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显示,美国第一季度经济收缩幅度为较小的0.2%,好于所发布的第二次读数0.7%,符合预期。第一季度消费者支出增加了2.1%,而之前公布的读数为1.8%。

在欧洲交易时段,美元指数——追踪这一世界储备货币相对其他6种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化的指数——下降了0.5%,削弱了其周二最高1.2%的涨势。但GDP数据的公布则使美元收复部分失地,在美国交易时段开始时,美元指数曾升高至95.432。美元兑欧元汇率收跌0.24%。更多的经济数据改善的迹象,将增加人们的如下预期——美联储最早可能在9月采取行动,而且夏末或秋初加息或许不是本日历年的最后一次。(FT中文网)

# 中国可借力中美战略对话加快改革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

中美今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在华盛顿举行。对中国而言,这一对话机制除了是与美国高层进行沟通和博弈的重要渠道外,还是一个可以借用推动加快改革的契机。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这个关键的政策篮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一直在推动让人民币被纳入该篮子,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其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

美国作为IMF的最大股东,是人民币加入SDR必须跨过的一道“坎”。中美在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讨论了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R)的投资宜。从讨论内容来看,美国正抓住中国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机会,再次敦促中国推进改革,以使人民币像美元和日元等那样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美国财政部长表示,“中国的外汇干预自去年对话以来明显减少”,积极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姿态;同时又敦促中国,“进一步的汇率制度改革非常重要”。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财政部长似乎又在玩原则上肯定、实际上设置障碍这一套游戏,想为人民币套上镣铐,迫使中国做出一定让步。不过,这种看法仍然没有摆脱“阴谋论”的思维。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虽然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是美国设定的筹码,但从本质上看,这也是中国的内在需求。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本身就意味着将采取措

施促进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实际上,中国正在采取措推动相关改革,如外汇管制已经放松,并且今年可能会进一步开放,向外资资金进一步开放中国的股市和债市,推出链接上海与香港股市的沪港通,并准备在年内推出深港通,实施中国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以及择机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境外投资试点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谈条件的同时,对于人民币加入SDR仍保持了建设性的态度。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当中国通过谨慎但彻底的方式进行改革并进一步自由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和中国世界都是有建设性的。”而不久前,美国国务院经济和商业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库尔特·童也表示:“我们持续鼓励中方在货

币操作中尽可能实现最大的灵活性(推进汇率市场化),我想这同人民币能扮演更大角色方面是拥有一致性的。”

由此看出,中美双方在关于人民币加入SDR的影响上,并无本质的冲突。虽然双方的利益不一,但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需求来看,加快金融领域改革的步伐,推动将人民币纳入SDR也是中国自身的需求。在不少时候,中国改革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如果能借着IMF体系将人民币纳入SDR来推动中国国内的金融改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来看,加快中国金融领域改革是中美在人民币纳入SDR问题上的共同诉求,中国需要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借势中美这一对话机制,继续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步伐。